

Lossing Buck, 1891-1975) 於 1921 年在金陵大學創建了中國第一個農業經濟系，並積極推動中國近代農業經濟學教學與研究的發展始末。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卜凱於教學之外的有關中國農業經濟的研究工作，他不僅建立起中國近代農業經濟的一套最完備的調查資料，並於 1930 年代出版兩本相關論著《中國農場經濟》(*Chinese Farm Economy*) 與《中國土地利用》(*Land Utilization in China*)，卜凱對中國農業經濟的觀點一直是後來的學者在探討相關問題時必須仰仗的起點。第 10 章綜述中國所有開設經濟學課程的大學梗概，例如北大、復旦、清華、南開、中山、武漢等等。以此為開場白，特雷斯考特接著分三個專章分別詳盡闡述南開大學、北京大學與清華大學的經濟學科教育。第 14 章特雷斯考特介紹了幾位在近代中國經濟學的開展上有著極重要貢獻的中國學者，例如方顯廷 (1903-1985)、吳景超 (1901-1968)、

裘開明 (1898-1977)、李卓敏 (1912-1991)、張培剛 (1913-) 諸人。

誠如本書所闡明：西方經濟學思想在 19 世紀被紹介進入中國，並在該世紀的最後十年內有著飛躍性的成長。這一結果與「教育」關係密切，而期間又有著中西文化競合的歷程。早期負笈西方研讀經濟學的中國人約有四分之三前往美國大學學習。1950 年之前，在中國大學教授經濟學的西方人士大多數亦是來自美國。再加上大量使用美式的教科書與其課程設計，此時中國大學的經濟學門儼然變成「美式經濟學」的展演場。日後伴隨愈來愈多非留學美國的歸國學人返國貢獻，上述情況稍獲改善。爾後中國的經濟學科在日趨嚴謹的課程設計的規制下，深具中國特色的經濟學門於焉成立。(溫楨文，政治大學歷史學研究所博士生)

Public Passions: The Trial of Shi Jianqiao and the Rise of Popular Sympathy in Republican China

By Eugenia Lea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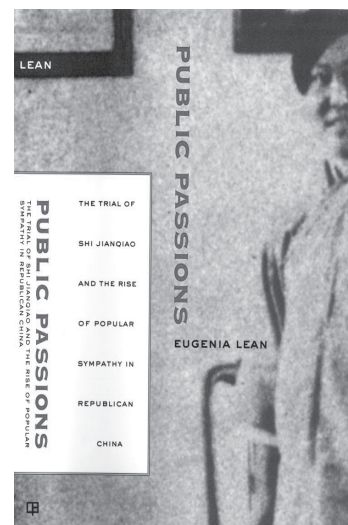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7

290 pp. ISBN 978-0-520-24718-5

本書是甫獲費正清東亞研究圖書獎 (John K. Fairbank Prize in East Asian History) 的專著，是以 1930 年代所發生的施劍翹刺殺孫傳芳的法律案件為主軸，旁及施案周邊關於案主形象、道德想像、傳媒報導、法律審判、性別政治，以及國家建構過程中傳統 vs. 現代的拉扯與張力等面向。

本書作者林郁沁 (Eugenia Lean) 2001 年自美國加

州大學洛杉磯分校獲得博士學位，現任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東亞語言與文化學系助理教授，本書便是源自她的博士論文修改而成。全書除導論與結論不計，共有六章。由書名來看，公眾情感及其政治參與是本書的主軸。作者將焦點置放在究詰 20 世紀前半葉的中國社會，是否出現如同哈伯瑪斯 (Jürgen Habermas)



筆下所指涉的歐洲「市民社會」(civil society)光景。作者所描繪的這段歷史，是一個充滿大眾傳媒、政治事件和公眾情感所構築的世界。在她筆下的公共空間並非如哈伯瑪斯所云是由布爾喬亞階級所肇造，而是經由公眾融入情感的政治參與，並經由大眾傳媒的推波助瀾所建構。作者認為不應耽溺在習以為常的現代性概念中，而需反思情感因素對現代政治參與的角色。

本書另一個研究取徑則是關乎女性殺人的提問。東西方處理情感的方式有別，歐洲法庭言行的理想規範和標準是：男人是理性的，女性被告得以被赦免，是因為人們認為婦女犯罪是由於嫉妒和憤怒而失去理性所致。相較之下，施劍翹案的核心問題不是理性而是美德。施劍翹對其父親的「孝」，是根植於中國傳統文化的深層要素，在傳媒中被轉換為「情」；而這個「情」的要素並非以理性與否的要點被檢視，而是評價這種「情」的倫理合法性。這個案件的關鍵在於法治與情感之間的張力。持論有別的雙方分別以條析法理和引經據典的方式進行攻防，控方的論調在於使用嚴密的法律論證對抗辯方的倫理敘事，這便是中國在現代化過程中所遭遇的困境與驅策動力的縮影。控方認為無論動機為何，施氏都須以現代的法律制度予以定罪，亦即援情入法此一手段對現代國家法律體制有所戕害，就如同阻礙現代國家成形的絆腳石一般。

在這個環節上，施案的重點在於由孝道所衍生的情感，在程度上是否可與倫理產生關聯？是否可由此來形塑性別、現代性自我，甚至是 20 世紀中國的社會——政治版圖？作者的答案是肯定的。她認為施劍翹最終獲得特赦，就是公眾情感所發揮的政治作用有以致之。她將這種情感稱之為“popular sympathy”（同情），並將這種情感視作 20 世紀前半葉的重要特徵。作者更進一步解釋特赦的理由，她認為國民政府藉由寬恕施劍翹來突顯軍閥政治的非正當性，以及向大眾呼籲其統治

合法性。施劍翹對父親的「孝」乃致於「情」的開展，代表了一個理想國家的美德。在推行儒家美德作為國家力量基調的新生活運動中，國民黨將施劍翹的復仇計畫轉換為效忠政府的隱喻，試圖把施劍翹當作一個民族象徵。施劍翹槍殺孫傳芳的這個戲碼，就成為國民黨據以宣傳剷除軍閥的象徵。

但傳媒則是從另一方面入手，將施劍翹的俠義與國民政府的無能形成鮮明對比，成為對現實政權的批判。施劍翹的行為在大眾傳媒中被讚揚為現代婦女美德和國家道德的典範，也有助於公眾同情的政治化過程，作為闡發對國民黨政策批評的基礎；也因而帶出 1930 年代的公眾情感與愛國主義，在戰爭中被認為是具有女性特質的。末了，作者討論 1930 年代以降施劍翹的處境與政治遭遇，施劍翹先前與國民黨攸關的俠義形象使她成為政治鬥爭的箭靶，她於是不惜以今日之我攻昨日之我，利用革命的修辭策略來隱匿這段過去。由此看來，施劍翹的形象是隨著政治氛圍而改易，亦即書中的「現代性自我」這個主題是依照現實的情況而被加以「挪用」(appropriation) 的。

透過作者擅於描繪的筆調，我們可以得知情感因素在現代政治的重要性。而這種公眾情感則是經由傳媒（特別是報紙）、小說和戲劇等的改編，成為 1930 年代城市文化的重要元素。作者認為在施劍翹案上，出現前所未有的集體情感政治參與，足以形塑法律審判程序與現代國家打造的途徑。換言之，作者筆下的「情」不僅塑造了一個新的都市公眾群體，也將這個群體政治化。因此，傳媒的消費者不只是被動的接受者，他們所發出「同情」的集體情感構成前所未有的道德和政治力量，足以撼動當時的國家與社會關係，成為法律權威不能再予以漠視的新政治力量。（陳建守，臺灣大學歷史學研究所博士生）